

开发重庆的巨大潜力

在新加坡和中国庆祝建交25周年之际，两国在本月5日签署了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项目落实地点在面积8.24万平方公里，人口3300万的重庆。

重庆市辖内包括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少数民族聚集区，是被中国政府确定为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其他四个城市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它是西部12个省及中部6个省中，唯一的一个位于中西部的直辖市；它是西部科技教育中心、加工制造业中心及商贸物流中心。作为中国西部科技教育中心，重庆有60多所大学，上百万大学生，还有300多所职业院校。尤其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之后，重庆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重庆原已具备了非常好的发展条件，所以，它成为新中两国间第三个合作项目可以说是“众

望所归”。重庆的巨大发展潜力至今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这也因此给新加坡带来很多的参与发展机会。

在接受本报的专访中，我国项目牵头部长及全国副总秘书长陈振声对这个项目作了进一步说明：新中将合力打造一个网络，而不是开发某个具体地点。这与新中之前两个政府间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和中中新天津生态城相比，概念上有根本的不同。

在具体落实上，建立一个网络是否比发展一个具体的城区更为困难或是容易，也许很难有个比较的标准。重要的是，最终还是必须看发展的结果是否符合两国的基本想法和目标。

重庆以及整个西部这些年来发展步伐跟东部沿海几个一线城市的发展差距越来越明显，

社论

2015年11月20日

中国西部占了国土面积的72%，2013年中国4.16万亿元人民币的进出口贸易额，西部只占了7.5%。西部脚步滞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对外开放不足是其中之一。陈振声得出的结论是：“西部的成本较高”，这包括了融资成本和物流成本。他说：“怎么样把融资与物流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率降到最低？这是我们思考的起点。”接下来两国必须在发展重庆这个网络上取得基本的共识，清除发展路上的障碍，在同一套思路下，制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个关键是，重庆既是网络上的一个点，那它也需要西部其他点的合作，成都、西安等重要城市必须认同重庆的发展理念，如西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物流成本要进一步降低，那么重

庆以外的其他西部城市也应该跟重庆配合。西部各省市的税收程序必须进一步的整合，这方面做不到的话，西部城市都难以从减轻营运成本中获益。

从涉及的地域范围而言，两国第三个合作项目是最大的，重庆项目扩大来说，就是西部的项目，西部重要城市都必须从这个网络上享受到好处，从而加快它们本身的步伐。在新中两国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框架协议里，也写明新加坡不排除与西安或成都合作搭建这个网络，为未来的方向预留了另一条途径，这也意味着，新加坡公私机构的参与机会不局限于重庆。中国西部如果能托这个项目之福，对外变得更为开放，就能打通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其中一个窗口，其长远好处对两国都是无可估量的。

区域焦点 周雷

南中国海成“难海”的根源

回顾2015年的南中国海海外舆情，全年热点不断，从岛礁建设、修建灯塔、香格里拉对话、菲律宾海牙国际法庭南中国海仲裁案、美国军舰巡航南中国海海域、亚太经合峰会期间的南中国海讨论等，南中国海问题事实上已经朝着全面国际化、争端化、军事化、准军事结盟的方向不断发展，为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提出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与此同时，在研究南中国海舆情，尤其是南中国海海外舆情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综合性的问题，它某种程度上在南中国海问题初期就已显现，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中国的南中国海主权声索一直没能主导话语权，而是不断去迎合南中国海周边声索国，甚至是南中国海之外国家如美、日、英、澳的话语挑战。中国以历史证据链和高活跃度的岛礁建设主要线索的南中国海维权努力，缺少其他国家的有力协同和道义支持，客观上形成了南中国海声索国互相结盟和协同的机会。

其次，当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和维护自然就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地理子课题”——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南中国海段，而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特别是与周边国家涉及争端问题上的国际回应、现实操作，事实上在形成一种“南中国海模式”或“南中国海判例”。也就是说，“南中国海案例”“南中国海解决模式”将被其他国家在处理类似问题时效仿。具体而言，当中国的海外崛起客观上改变安达曼海、印度洋、黑海、地中海、红海、亚太、大西洋、极地等地缘和海缘政治格局的力量均衡时，其他国家会不断通过中国政府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模式，来理解中国在海外的扩散性全方面存在，并利用这种既有模式来反制中国。

其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崛起，都面临一个尴尬——尚无能力建立国际传媒新秩序，当用英文搜索南中国海或“东海”“西菲律宾海”时，真正的话语强势和媒体报道格局仍然为欧美媒体所控。东南亚社会整体上需要寻找更好的语言和文化融合，形成自己的中介语和合作媒体框架，必要时形成新的媒体国际架构，例如海上丝绸之路国家媒体集群、海上事务亚洲媒体委员会、海上亚洲媒体集

只有先建构传播意义上的“亚洲海”，才能暂时搁置刚性的海上资源和主权争端，避免亚洲海域的“加沙化”，并同时寻找更多的亚洲海上时代的共同福祉性话题。

团、南中国海媒体战略对话。只有先建构传播意义上的“亚洲海”，才能暂时搁置刚性的海上资源和主权争端，避免亚洲海域的“加沙化”，并同时寻找更多的亚洲海上时代的共同福祉性话题。

2015年7月27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亚太海洋安全战略》报告，成为东南亚国家媒体引用率极高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到了美国对“海洋自由”“海洋国际秩序”“美国海洋利益”的高度关注，并指出了亚洲几个重要海域保持国际航行自由的必要性。

报告指出亚洲海域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重要作用，全球最繁忙的海港，前十名在亚太区域；每年南中国海的海上贸易占据全球30%的量，其中1.2万亿美元的商品以美国为目的地；全球三分之二的油类运输通过印度洋进入太平洋；2014年马六甲海峡每天运输的石油就达到1500万吨。

报告通过列举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具体军力、岛礁建设规模、持续“扩张”的具体数据，成为东南亚许多国家媒体在表达同类话题征引的主要数据来源。

虽然美国这里捍卫的自由、国际法实际上是美国人主导的自由，以及美国阐释和断章取义的国际法，但是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对这一事实进行选择性忽视。

美国“挟国际法以令东盟（亚细安）”，实际上进入东盟的核心政治、经济、军事区域进行扩张性巡航，虽然它此次的目标是针对南中国海，但也标示了美国对整个亚洲海洋疆域的强力占有。东南亚一些国家通过美国的人侵性协防，虽然可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获得短期好处，但是它整体破坏的是亚洲国家海上世纪的内在建设性和对话能力，将形成新的战略性、军事性结盟，并形成基于不同海域的

强竞争、弱合作长期争端态势。

作为一种历史问题，南中国海具有不同的声索国历史记忆和历史证据链，这本是亚洲国家内部的事务。但是亚洲国家还要看到，亚洲国家真正的未来风险是政治上的不互信，军事上的结盟和分化，民间社会的彼此排斥和敌对情绪，经济上的分化和恶性竞争，环境意义上的“亚洲公地悲剧”——因为恶性竞争，失去联系亚洲生态纽带（海洋、河流、山系、植物区系）的内在生态性和文化互通可能性。

因此，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军事为主线亚太海洋报告，并不是亚洲海洋的真正未来，它实质上产生亚洲社会的另一次分化和彼此为敌，它将为更多的亚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失范”滋生毁灭性的土壤，为亚洲未来带来更大灾难。

与此同时，美国皮尤中心也公布了一项引用率较高的报告，《亚太区域的公众如何互看彼此》，以及国家领导人的形象认知，它指出一个令中国读者不安和不甘的数据，在亚太区域领导人当中，最受公众喜爱的是日本的首相。不断军事化、为法西斯招魂的日本首相，在亚太区域获得71%的喜好率。

作为舆情测度研究，对于南中国海的关注如果可以还原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军事扩张”“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加沙化和局部战争”“对美国长期巡航亚洲海域”“对亚洲海洋新军事结盟和第三次世界大战隐忧”“对军事升级造成亚洲海洋环境破坏和经济繁荣破坏”“对美国进入亚洲海域是否会造更强的军事监控和殖民代理权”这类具体问题是否关注，它会得出什么样的数据？

皮尤中心抓住领土争端的问题，将它作为主要的测量维度，整体淡化、弱化，甚至隐藏了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背后的许多真实且复杂的问题，是在测量意义上专业，但是研究目的意义上卑劣的代表性作品。

从美国意图主导亚洲海洋事务，日本等国成为“殖民代理”的南中国海争端时代，可以看出南中国海的实质是：亚洲海洋的安定和繁荣，将使亚洲各国受益；亚洲海洋的纷乱甚至战乱，可以使某些国家更受益；亚洲不是一损俱损的共同体。作者是中国南中国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谈古论今 施泰因迈尔

施密特的世界

前总理施密特上周以96岁高龄逝世时，德国失去了一位巨人。施密特从1969年至1972年任德国国防部长、1972年至1974年任财政部长、1974年至1982年任联邦总理。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似乎格外动荡不安；但施密特治理德国的时期也根本无法用稳定来形容。

施密特的时代，是东进政策和国际关系缓和的时期。期间爆发了首次全球石油危机、经济衰退、滞涨、和欧洲重新出现大规模失业危机。他那人面对了国内恐怖主义，并目睹了伊朗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

人们记忆中的施密特，是一名亲力亲为的实用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名成功的危机管理大师。他很早就证明了自己的判断和领导能力。担任汉堡市参议员时，他成功克服了几乎摧毁该城市的1962年大火灾。施密特一直对宏伟计划和长期愿景抱怀疑态度，凸显了他实用主义者的形象。不过，他从未放弃自己的基本信念，即自己的政治目标有其道德根基。因此，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是他最喜爱的哲学家就不足为奇了。波普尔务实但以价值为基础的方式，与施密特不谋而合。

但这些不是施密特世界观的全部。出身于德国最大港口城市的他，是一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对境外事务有浓厚兴趣。他崇拜波普尔的学说、背负着纳粹时代的沉重记忆和灾难伤痕，终其一生都对我们的开放社会的优势和弱点有着敏锐的认识。

谦卑和耐心处理外交

施密特清楚知道，一名实际的政治家要在事件发生时积极面对，尽可能明智地处理。但他也本能地知道，日常事件受到不可阻挡的趋势和力量的影响：东西方之间的战略竞争、全球相互依存时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化、和去殖民化地所造成的后果。他是最早注意到中国崛起，和亚洲可能重返世界舞台领导地位的德国领导人之一。

他认为，透彻的分析是采取政治行动时必须用事，也不能容忍愚蠢的人。他一直为自己的信念而努力。

他和法国总统季斯卡（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合力推动建立七国集团协调国际经济政策，并在1975年于朗布依埃（Rambouillet）举行的首届七国峰会上发

挥了领导作用。同年，他在赫尔辛基与东德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并肩而坐，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终极文件”。这是缓和政策的重大突破，开启了苏联和华约组织内部的封闭社会。

施密特与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的关系并不融洽，这一事实很多人都记述过。但施密特一直是跨大西洋亲密伙伴关系的坚定倡导者，认为这是德国安全和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上，他在1977年一次重要演讲中表示，对抗苏联部署SS-20中程核导弹计划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害怕苏联的行动会造成欧洲和美国分离。

施密特1979年对所谓北约双轨决定的承诺，即最终将消除欧洲的中程核导弹，令他的党内同僚倍感气愤。但这是他在认真、冷静考量战略格局演变后所做出的决定。

最后，施密特以欧洲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他经历了极端民族主义给德国带来的社会灾难，对不可逆转的进步的理念一直有所怀疑。对他来说，改变不会来自星期日的演讲，只会来自实际的举措。

因此，欧洲一体化必须通过切实的政策和制度，而不能通过法令实现。他和季斯卡创建的欧洲理事会（由欧洲政府首脑组成），现在已成了欧盟机制的主要参与者。他们推动的货币一体化构想，在下一代人身上开花结果。他们具体表达了对统一、和平欧洲的法治承诺。这种承诺，只有在统一目标的指导下行事，才能影响全球。

在退出政坛后的数十年里，施密特仍然为德国民众扮演了导师的角色。国际危机、全球秩序和欧洲的未来仍然是他最基本的关注。他认为德国在解决和影响这三大问题上，有责任扮演力所能及的角色。

他的思维有着强烈的规范性基础，但他对世界的敏锐理解，令他能以谦卑姿态和战略耐心处理外交政策。这种难得一见和道德原则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正是他作为外交政策思想家和实践家留给后世的遗产。现在，他已不能亲自提醒我们，我们最好能够牢记他的思维重点和原则。

作者Frank-Walter Steinmeier是德国外交部长。
英文原稿：Helmut Schmidt's World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5

时事透视 甄鹏

政党领袖的幕后领导

《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九条明确了总统和副总统的任职条件。其中，第（六）项规定：“本人、父母、配偶、婚生子女及婚生子女配偶，不得是效忠外国政府的人，不得是外国政府的附庸，不得是外国公民；上述人士不得是因为是外国政府的附庸或是外国公民而享受外国政府提供利益的人。”因此，在大选中获胜的全国民主联盟（简称“民盟”）主席翁山淑枝，无法当选总统或副总统。

在选前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翁山淑枝语出惊人，声称如果民盟赢得大选，她的地位“将高于总统”。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民盟发言人年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翁山淑枝要像“邓小平那样”治理缅甸。冯创志在《联合早报》撰文，认为翁山淑枝将开启“垂帘执政”模式。（《翁山淑枝“垂帘”执政孰喜孰忧》，11月18日言论版）

在现代民主制度中，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都有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议会制国家，执政党领袖作为政党代表，发挥着核心作用。例如，我长期研究波黑问题，波黑的国家元首是三人主席团，政府首脑是部长会议主席。然而，波黑的实权在执政党领袖手中。国际社会和高级代表召开重大改革会议，都邀请政党领袖参加。多年来，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主席多迪克无论担任任何公职，都是塞族最有权力的人。

缅甸《宪法》规定：“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缅甸应属于总统制国家。不过，由于缅甸总统是间接选举产生的，即由国会选举产生，执政党在决定总统人选的过程中，拥有最大的话语权，而当选后的总统也将征求（甚至听从）执政党的意见。这是翁山淑枝充当幕后领导人的理论基础。

这是现代民主制度所允许的。所以，“垂帘听政”（或者“垂帘执政”）的非常规做法和提法，不适用于翁山淑枝。邓小平没有担任执政党的总书记，而只是军委主席，缺乏掌握政权的依据。他属于因掌握军权而操纵政权的强人治理模式，是“垂帘听政”的一种类型。

缅甸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宪法》也规定：“在缅甸联邦共和国全体国民中处于最高地位。”因此，翁山淑枝不可能“地位”高于总统。她可以“作用”高于总统。翁山淑枝在缅甸政坛发挥关键作用的时候，应对《宪法》表现出基本的尊重。

缅甸《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系某政党成员的，自当选之日起直至卸任，不得参与所在政党的一切事务。”与一些国家的做法一样，缅甸要求总统超脱于政党，保持相对中立。翁山淑枝可以决定谁当总统，可是总统当选后听不听话，就难说了。

作者是中国山东大学学者



早报漫画 蔡新友